

蒋廷黻
著

中国近代史

— 史学精粹，传世经典

中国当代历史学家、外交家，南开大学历史系奠基者蒋廷黻的经典力作
中国史学界公认的近代史开山之作，深受近代史学者们的推崇和追捧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©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，2020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中国近代史 / 蒋廷黻著. --北京：民主与建设出版社，2019.12

ISBN 978-7-5139-2848-9

I.①中… II.①蒋… III.①中国历史—近代史
IV.①K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9）第270429号

中国近代史

ZHONGGUO JINDAISHI

著 者 蒋廷黻
责任编辑 彭 现
特约策划 邓敏娜
特约编辑 周 维
封面设计 MIMI末末美书
003216618296
版式设计 姚梅桂
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电 话 （010）59417747 59419778
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10号望海楼E座7层
邮 编 100142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版 次 2020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20年3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10.5
字 数 280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139-2848-9
定 价 32.80元

注：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

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。在此以前，华族虽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，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，纵使他们入主中原，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。到了十九世纪，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，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、美、法诸国绝非匈奴、鲜卑、蒙古、倭寇、满人可比。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，一个是西方的欧美。两个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关系，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，而且是可有可无的。在东方这个世界里，中国是领袖，是老大哥，我们以大哥自居，他国连日本在内，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。到了十九世纪，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，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。

嘉庆、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。直到现在，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。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断定的。第一，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比。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。第二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、美两国的完备，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。第三，我国秦始皇的废分封为郡

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，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。是故论人论地，中国本可大有作为。

然而到了十九世纪，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？第一，我们的科学不及人。人与人的竞争，民族与民族的竞争，最足以决胜负的，莫过于知识的高低。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，好比汽车与洋车的比赛。在嘉庆、道光年间，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，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作八股文，讲阴阳五行。第二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叶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，而我们的工业、农业、运输、军事仍保持唐、宋以来的模样。第三，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，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。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，西洋人养成了强烈的爱国心和深刻的民族观念。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。所以在十九世纪初期，西洋的国家虽小，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；我们的国家虽大，然如一盘散沙，毫无力量。总而言之，到了十九世纪，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，而东方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，我们是落伍了！

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：中国人能近代化吗？能赶上西洋人吗？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？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？能的话，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；不能的话，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。因为在世界上，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，不能者必遭惨败，毫无例外。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。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，日本的原有土地面积不过中国的一省，原有的文化几乎全是隋、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。近四十余年以来，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成为一个头等的国家，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。我们也可以把俄国做个例子。俄国在十五世纪、十六世纪、十七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，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，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。可是在十七世纪末，正当我们的康熙年

间，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彼得大帝，他以专制皇帝的至尊，变名改姓，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，学炼钢。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，帮助他维新。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，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国粹党。他不顾一切，奋斗到底，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但是滨海的涅瓦河旁，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。俄国的近代化基础是彼得大帝立的，他是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，所以今日的斯大林还推崇他。

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量之大。在十九世纪初年，土耳其帝国的土地跨欧、亚、非三洲，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战的。在十九世纪百年之内，别国的科学、机械和民族主义有一日千里的长进，土耳其则只知保守。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欧洲列强的宰割。到了光绪四年（一八七八年）以后，土耳其也有少数青年觉悟了非维新不可，但是他们遇着极大的阻力。第一，土耳其的国王，如我国的清朝一样，并无改革的诚意。第二，因为官场的腐败，创造新事业的经费都被官僚侵吞了，浪费了。国家没有受到新事业的益处，人民已加了许多的苛捐杂税，似乎国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穷。关于这一点，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国的近代史。第三，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，以至有一个人提倡维新，就有十个人反对。总而言之，土耳其在十九世纪末期的维新是三心二意的，不彻底的，无整个计划的。其结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战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）中的惨败，国家几致灭亡。土耳其人经过那次大国难以后，一致团结起来，拥护民族领袖凯末尔，于是始得复兴。凯末尔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，不知有他。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，知道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。他不但提倡科学工业，他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，因为土耳其的旧文字太难，儿童费在文字上的时间和脑力太多，能费在实学上的必致减少。现在土耳其立国的基础算打稳了。

日本、俄国、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说的那个样子。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、机械及民族主义，于是复兴了，富强了。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，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。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。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。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，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。

目录

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

- 一 旧社会走循环套 / 29
- 二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/ 32
- 三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/ 36
- 四 洪秀全失败 / 39

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

- 一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/ 3
- 二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/ 7
- 三 东西对打 / 10
- 四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/ 14
- 五 不平等条约开始 / 17
- 六 剿夷派又抬头 / 19
- 七 剿夷派崩溃 / 23

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

- 一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/ 45
- 二 步步向前进 / 49
- 三 前进遇着阻碍 / 51
- 四 士大夫轻举妄动 / 56
- 五 中日初次决战 / 63

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

- 一 李鸿章引狼入室 / 75
- 二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/ 79
- 三 顽固势力总动员 / 83
- 四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/ 87
- 五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/ 92
- 六 军阀割据十五年 / 97
- 七 贯彻总理的遗教 / 100

附录一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

附录二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

- 一 中西方关系发生变化 / 112
- 二 欧洲人的蚕食 / 114
- 三 葡萄牙设法通商 / 117
- 四 国外殖民势力更替 / 123
- 五 康熙帝的外交 / 127
- 六 外交政策不进反退 / 130
- 七 马戛尔尼来华 / 134
- 八 英国输入鸦片 / 140

- 九 鸦片战争前后 / 145
- 十 “抚夷”的难题 / 148
- 十一 “剿夷”外交的代价 / 151
- 十二 俄罗斯侵吞国土 / 154
- 十三 自强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/ 155
- 十四 尾言 / 157

附录三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（从顺治到咸丰）

小引 / 161

- 一 俄国的远东发展 / 162
- 二 中俄初次在东北的冲突 / 167
- 三 尼布楚交涉 / 177
- 四 《尼布楚条约》之条文考 / 187
- 五 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 / 190
- 六 俄国假道出师与胁诱割地 / 197
- 七 俄国友谊之代价 / 207

附录四 琦善与鸦片战争

引言 / 221

一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/ 224

二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/ 234

附录五 南京的机会与日本的“和平”

一 “九一八”事变与《独立评论》 / 245

二 “九一八”的责任问题 / 260

三 国联调查团所指的路 / 265

四 南京的机会 / 272

五 热河失守以后 / 276

六 长期抵抗中如何运用国联及国际 / 281

七 这一次的华府会议 / 286

八 我们目前对于“中央”最重要的希望 / 291

九 “九一八”——两年以后 / 294

十 国际形势的分析 / 29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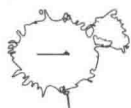
十一 论“日本和平” / 304

十二 经过“满洲国” / 309

十三 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 / 315

第一章

剿夷与抚夷



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

在十九世纪以前，中西没有邦交。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，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。此中的缘故是很复杂的。第一，中西相隔很远，交通也不方便。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。那时没有苏伊士运河，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，从伦敦到广州顶快需三个月。因此，商业也不大。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。我们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，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。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。

还有一个缘故，那就是中国不承认与别国平等。西洋人到中国来的，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、高丽人看待。他们不来，我们不勉强他们。他们若来，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。这个体统问题、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，“天朝”是决不肯通融的，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，并且外夷是蛮貊之邦，不知礼义廉耻，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？他们贪利而来，“天朝”施恩给他们，许他们做买卖，借以羁縻与抚绥而已。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，“天朝”就要“剿夷”。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，只知道“剿夷与抚夷”。政治家分派别，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，有些主张抚。

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，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。在明末清初的时候，西洋人曾到过漳州、泉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定海各

处。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，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，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。在广州，外人（即外国人）也是不自由的，夏秋两季是买卖季，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，买卖完了，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。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。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，也是政府的交涉员。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；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。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，事实上官吏很通融。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，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，逢八（那就是初八、十八、二十八）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“花地”去游一次。他们不能带兵器进广州。“夷妇”也不许进去，以防“盘踞之渐”。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，不得学中文。第一个耶稣教^①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，每次去授课的时候，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，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，不是去教书的，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，可以自尽。

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，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，平均不过百分之四，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。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，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的百分之二十。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；事实上，官吏绝守秘密，以便随意上下其手。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，因此很不耐烦。

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。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，我国官吏不愿过问，那就是说，自动地放弃境内的法权。譬如乾隆十九年（一七五四年），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，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。后因英国坚决要求，官厅始理问。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，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

① 耶稣教，亦称基督新教，英文Protestantism的意译。



之苦。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，官厅决不偏袒，总是杀人者抵死，所以外国人很满意。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，中国人要求外人交凶抵死，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，外人遵命者多，以后则拒绝交凶，拒绝接受中国官厅的审理，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，审判手续太不高明。

外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，然而觉得既然是中国的定章，只好容忍。到了十八世纪末期（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），外人的态度就慢慢地变了。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。在广州的外人之中，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。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，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地变为机械制造。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，中国对通商的限制，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。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，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。以后再往东亚发展也就更容易了，因为有了印度做发展的根据地。

当时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。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做出来的。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，他必愿意改革。乾隆五十六年（一七九一年）正是乾隆帝满八十岁的一年，如果英国趁机派使来贺寿，那就能得着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。^①广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虚荣心，竭力怂恿英国派使祝寿。于是英国乃派马戛尔尼勋爵（Lord Macartney）为全权特使来华。

马戛尔尼使节的预备是很费苦心的。特使乘坐头等兵船，并带卫队。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出品。用意不外乎是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而且文明的国家。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是要他竭力

① 一七九二年英国以补行祝寿为名派公使来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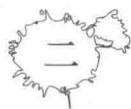
迁就中国的礼俗，唯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。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：第一，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，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去，英廷必以最优之礼款待之。第二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。第三，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、公开的海关税则。第四，英国希望中国给他一个小岛，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货，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。在乾隆帝方面，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，但是乾隆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，要他行跪拜礼。马夏尔尼最初不答应，后来有条件地答应。他的条件是：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，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；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。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。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，也就拒绝行跪拜礼。乾隆帝很不开心，接见以后，就要他离京回国。至于马夏尔尼所提出的要求，中国都拒绝了。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了。

十八世纪末期和十九世纪初期，欧洲正闹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，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业的发展。等到战事完了，英国遂第二次派使节来华，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同。但是嘉庆给英使的待遇远不及乾隆，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败，并且私人对我们的感情也不好。

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，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。

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。在鸦片战争以前，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；在以后，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。

到了十九世纪，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，但是嘉庆、道光、咸丰年间的中国人，不分汉、满，仍图闭关自守，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，根本否认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。我们倘若大胆地踏进大世界的生活，我们需要高度的改革，不然，我们就不能与列强竞争。但是我们有与外人并驾齐驱的人力物力，只要我们有此决心，我们可以在十九世纪的大世界上得着更光荣的地位。我们研究我民族的近代史，必须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，也是我们的大机会。



英国人做鸦片买卖

在十九世纪以前，外国没有什么大宗货物是中国人要买的，外国商船带到中国来的东西只有少数是货物，大多数是现银。那时经济学者，不分中外，都以为金银的输出是于国家有害的。各国都在那里想法子增加货物的出口和金银的进口。在中国的外商，经过多年的试验，发现鸦片是种暴利的商品。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乃奖励种植，统制运销。乾隆初年，鸦片输入每年约四百箱，每箱约百斤。乾隆禁止内地商人贩卖，但是没有效果，到了嘉庆初年，输入竟加了十倍，每年约四千箱。嘉庆下令禁止进口，但是因为官吏的腐败和查禁的困难，销路还是继续加增。

道光对于鸦片是最痛恨的，对于禁烟是最有决心的。即位之初，他就严申禁令，可是在他的时代，鸦片的输入加增最快。道光元年（一八二一年）输入尚只五千箱，道光十五年（一八三五年），就加到了三万箱，价值约一千八百万元。中国的银子漏出，换这有害无益的鸦片，全国上下都认为是国计民生的大患。广东有班绅士觉得禁烟绝不能实行，因为“法令者，胥役之所借以为利也，立法愈峻，则索贿愈多”。他们主张一面加重关税，一面提倡种植，拿国货来抵外货，久而久之，外商无利可图，就不运鸦片进口了。道光十四五年的时候，这一派的议论颇得势，但是除许乃济一人外，没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公开提倡这个办法。道光十八年（一八三八年），黄爵